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问题

张 本

改革是千百万群众的要求,也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怎样把群众的要求引上正确道路,把自发的力量变成自觉的力量,把分散的力量变成统一的力量,既要依靠方针、政策,又要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理解和贯彻改革的方针、政策,更重要的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理论上的提高是根本的提高,理论教育是思想教育的基础和核心。

一、理论的重要性

理论的重要性全在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

理论之所以能够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因为它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对推动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的现实性,理论可以指导人们剖析现实状况,揭示现有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指导当前的行动,从而改变现实,这一点比较明显,也容易受到重视;二是指理论的预见性,理论同时可以指导人们预计未来的状况,确定未来的目标,分析实现目标的条件,把当前行动与未来目标结合起来,从而超越现实,这一点比较隐含,因而容易被忽略。相对来说,理论的预见性当然更为重要,因为脱离未来目标来改变现实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降低行动的自觉性,既谈不上为实现未来目标创造必要的条件,也不可能预先防止未来才会出现的不良后果。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根据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及其未来发展制订出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奠定了理论的世界观基础——唯物史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它的基本原理做了概要的论述^②。恩格斯1859年为这部著作所写的书评指出,“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并且进一步指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③这个伟大的远景——共产主义鼓舞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和要求社会进步的广大群众,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应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一般地预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但在具体论及俄国革命的历史条件时并未排除从农村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其实1877年马克思就同一问题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已强调,“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⑤由于存在历史环境的问题,他给维·依·查

苏里奇的复信曾经三易其稿，最后也只能极其概括地重申必须考虑历史环境的思想。^⑥1917年，俄国终于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先于西方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这之后，苏联人民便以空前的发展速度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我国则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就说明理论的预见性并不在于为解决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面临的具体历史课题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案，而是为解决这些历史课题提供必须遵循的方向和预定的奋斗目标。这里面就包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主观能动作用要求全面、深入地把握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要求根据新的变化制订行动的纲领，要求行动的纲领符合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正是这种主观能动作用最充分地体现了理论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如果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算起，迄今已近70年了，它导致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巨大成就，其伟大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但也应当承认，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无论从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来看都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十年动乱就是最为突出的例证，说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不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不用说自觉地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了。去年北京地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和其它一些城市发生的动乱是一个新的例证。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存在“个人迷信”的问题，是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政治运动，那么这次动乱只能说明参加闹事的大学生理论素养较差，没有深刻理解改革的实质和复杂性，未能正确认识和积极地对待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理论和失误。理论的立场是原则的立场，理论上的模糊必然动摇原则的立场。社会变革在它的进程中总会遇到各种重大事件和曲折，引发各种“左”的或右的社会思潮。对于这些思潮的批判，如果没有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对事件和曲折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就不可能获得理论上的提高，从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转变始终伴随着理论立场的转变，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确立来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致力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们之所以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理论工作，就是为了发展和加强工人阶级的理论立场，这是工人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重要条件，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使全人类获得最终解放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对这个思想重复做了概括的表述：“至于谈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⑦

理论的重要性已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经历和发展所充分证明，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首先是受理论本身性质的影响。理论既然来源于实践，理论的价值全然体现于实践，而理论的正确与否归根到抵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有可能造成某种错觉，使人们容易片面地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另一方面，理论本身并不直接指导行动，这中间还要经过诸如方针、政策、计划、措施、分工、协作等等一系列把理性变成感性的中间环节和中介的作用，理论的作用并未直接表现出来。生活本身要比理论丰富、复杂、生动、易变得多，错误的理论有时还可以在现实生活的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些具体事件中获得某种“成功”，因而给人一种“正确”的外貌，反之亦然。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础，其重要性通常只是反映于全局的变化和远期的变化，不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就难以深刻理解。

其次，理论与政治密切相关，但并不相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是内在的、有机的统一，不是外加的、机械的统一。外加的、机械的统一既损害了科学性，也削弱了政治性。缺少科学性的政治性便会失去说服力，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把理论看成一

种政治注释，一种服从于策略需要的舆论工具，一种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文章，一种不需要过于认真对待的政治晴雨表。反之，理论如果根本脱离政治，便会流于空谈，甚至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久而久之，人们就会把理论看成一种高深莫测的大道理，一种值得仰慕的学术造诣，一种书斋里面的事情，一种知识分子的职业病。

官僚主义的蔓延也是导致忽视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官僚主义的本质是缺少创业精神和使命感。官僚主义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诸如指标、报表之类的东西，至于怎样把本职工作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怎样加强集体和社会的政治凝聚力等等需要理论指导来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不感兴趣的。官僚主义者就连一般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都会感到格格不入。至于那些以权谋私的腐化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不仅是不重视，而且简直是心怀恐惧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灾难。

理论本身的落后状态是它未能受到普遍重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建国以来，我们基本上从一开始便承袭了苏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主要任务首先在于学习、领会和宣传。这样，苏联体系本来就含有的封闭、保守的倾向不仅没有彻底消除，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和加深，一定程度地压抑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这种弱点后来被林彪、江青等人所利用，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歪曲和篡改，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中的形象；另一方面，闭关自守也限制了理论视野，看不到当代的科技进步和由此引起的世界变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这也是使理论减弱了本身的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归根到抵，人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理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不是按照理论准则而是按照价值观念去思考、判断、取舍和行动。价值观念虽受文化传统、风俗习尚、道德规范、科学知识、自我意识，交往关系等等因素的影响，终归取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取决于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理论只有克服人们的价值观念才会受到重视，只有说明价值观念才能克服价值观念，只有揭示现存生产方式的本质才能说明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为全面揭示生产方式的本质提供了完整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理论，但是如果不去应用或者不正确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那就无法融合价值观念和理论，至多也只能把理论当作神物供奉起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只要抓住事物的根本就能说服群众，只要说服群众就能变成物质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什么是事物的根本，理论如何抓住这个根本，这是必须具体回答并且做出充分论证的首要问题。

二、理论教育的迫切性

理论教育之所以迫切，是因为我国和全世界都在发生重大而剧烈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产生种种现实问题和人们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不做出回答，人们就会自发地回答，就有可能发展种种偏离社会主义的倾向，甚至提升为理论而对立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我国正在深化的体制改革是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实行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造成了大动乱，也搞乱了理论是非。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为拨乱反正扫除了思想障碍。但也应当看到，“文化大革命”涉及如何评价建国十七年的问题，涉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也涉及象“怀疑一切”“造反有理”“‘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样一些哲

学世界观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拨乱反正多半得到原则的回答，但不一定都在理论上做了透彻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人们的思想深处仍然留有种种疑问，更没有表现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增强和统一。这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作为潜在的消极因素逐渐表现出来，深刻影响这一进程的发展。

体制改革是把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制订的战略方针。问题在于实行这种战略转变为什么要改革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改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体制，在于如何在改革中协调经济、政治和思想三个方面。新的经济体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允许一部分私有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和租赁制度；在分配上采取工资、奖金、补贴、私人利润和个体盈利等多种方式，同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宏观调控上推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把竞争机制引进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这种改革必然扩大人们之间的经济差别，分化出不同类别的利益集团，牵动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产生种种新的矛盾。有的矛盾是由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引起的，随同改革的深化和体制的逐步完善自然得到解决；有的矛盾则同改革触及的个人利益和对改革所持的不同态度密切相关，随同改革的深入发展有可能日益尖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存在物质生活和交往关系的根源，而且存在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很明显，如果不具体分析我国的历史道路，全面总结以往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充分论证改革及其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实质，深入阐明改革必然产生的矛盾对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和进一步解决矛盾所必须创造的条件，把思想教育提到理论和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有的矛盾就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激化，甚至有可能集中到党的领导上来，发展成对抗。

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需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改革又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生产落后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开放必然带来一个怎样看待西方世界的问题。我们同西方的文化交流，不仅流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流进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从萨特、弗洛伊德到各种超现代派文艺思潮，从可口可乐、汉堡包到肯塔基鸡，从流行歌曲到摇滚乐、霹雳舞，从服饰美、形体美到选美竞赛，这就给经济领域带来一个以消费引导生产的问题，在市场繁荣的景象中激起一股超前消费的暗流，就在政治思想上分化出一种崇拜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思潮，出现了《河殇》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作品和它的赞赏者，出现了“西方热”和“出国迷”。所有这方面的问题决不是单纯依靠行政措施、经济制约和一般思想教育所能解决的，如果不提高理论素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从本质上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就有可能动摇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甚至侵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灵魂。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已经广为普及，但也应当承认，普及的范围主要限于干部和知识分子。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生产落后，文化教育更落后，侈谈理论教育不仅脱离实际，而且无疑是夸大了理论教育的意义和作用，颠倒了先后关系，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毫无疑问，理论教育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也需要文明的相当发展，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对于理论的需求。中外历史都已证明，现代工人、现代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渴望了解自己被剥削、受统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了解革命的道理，了解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文化基础和文明发展不是理论教育的绝对界限，革命战争年代大批工农出身的干部就是突破这种界限培养出来的。不能认为现在的条件反而不如战争年代的条件，更不能认为群众的理论需求随同革命的胜利

而终结。坚持上述观点的理论家们大谈群众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唯独不谈理论需求，似乎社会主义的全部涵义就是过上好日子，似乎群众根本不要求从理论上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周围的变化，似乎没有理论意识的不断发展也能把社会主义推向共产主义，似乎党的领导不需要群众理论素养的提高也能巩固和加强。今天，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思想问题，面对改革、开放提出的现实问题，面对西方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势，理论能否满足群众的需求已经成为对于理论教育的严峻考验。

三、怎样加强理论教育

加强理论教育首先要明确认识革命和建设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教育的对象、任务、内容、形式和条件都有很大改变，因而也要在观念上有所转变。固定不变的观点实际上是否认客观世界的变化，割裂马克思主义同历史进程固有的联系，抹煞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实践的本性，把它看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哲学家的书斋哲学，一种纯粹的哲学知识。

我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来实现的，基本力量是拿起武器和穿上军装的农民。他们参加革命的直接动力主要是翻身求解放的朴素要求，战争只要求他们接受粗浅的阶级教育、纪律教育和战术教育就足以克敌制胜了。这就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似乎理论教育只是对于党员和干部才有必要，于是便把眼光转向书本，转向系统、高深的理论知识，理论教育越来越脱离广大群众，也越来越脱离伟大的生活变革。如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允许群众带有较多的自发性，社会主义建设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人们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自发建设好社会主义，自发成长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因此，理论教育必须面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面对广大群众。

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和最高形式。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理论主要围绕对敌斗争的主题展开，整风的主要目的也是把思想统一到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标上去，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成为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敌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毫无疑问，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企图仍然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丝毫不可忽视，但是就主要的任务来说，还是解决亿万群众的自我教育的问题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问题，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并且随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在政权问题上，基本任务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贯彻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各个领域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理论教育的中心课题应当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它的内容要比单纯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比武装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加强理论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加强理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理论研究开拓了广阔天地，注入了强大活力，把理论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应当承认，在大力开展物质文明建设的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存在时紧时松、高一阵低一阵的现象；同时由于把市场竞争机制不适当地引进科研部门和教育部门，冲击了理论发展特有的规律，给理论研究造成一些片面发展的现象，主要是质量的提高落后于数量的提高，基本问题的研究落后于实用问题的研究，宏观的研究落后于微观的研究，综合的研究落后于分散的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争议没有深入开展下去，一些迫切的理论课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倾向也对理论研究产生种种消极影响，主要是撇开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的问题来对待理论争议，在理论研究中不注意或者有意识地回避如何划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界限的问题，从“左”倾教条主义的偏向走向右倾取消主义的偏向，似乎任何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交锋都会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似乎只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没有给它下过明确的定义，本来也不是任何定义所能充分阐明或者通过定义就能透彻领会的。这是因为它作为哲学世界观引起了历史科学的革命性变化，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最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主体和周围世界的相互关系，从而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前景、途径和这种发展的本质，它比其它任何学说都更能吸收科学和文明的成果，为人类自身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它在理论上引起广泛的多方面的研究和争议，在实践中导致工人运动和国际共运中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的种种分歧，是并不奇怪的。然而它并不象某些西方学者宣称的那样，已成为“一个空洞的记号”，“不同实践的名称”。^⑥为了澄清混乱，我们就必须揭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把它作为完整的整体进行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解放思想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但并没有全面揭示实践范畴的哲学内涵，特别是它的主观方面和主观过程，没有从理论上辨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同人本学的、存在主义的、实践批判论的、实践本体论的以及其它哲学流派的实践概念的根本差别，没有注意划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界限，也没有具体论述实践标准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领域的特殊应用。价值观念基本上还一直被排除在实践范畴以外。“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本质和特征近几年才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也比国外晚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⑦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人的主观方面如何发挥动力的作用，个人物质需求的满足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统一在个人主观上怎样体现为生产的动力，个人贪欲与社会主义意识存在怎样的关系，社会主义意识的增长受到何种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些互相关连的问题都还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完整的说明。

“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曾经引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持久不衰的论争，导致形形色色“异化理论”的出现，在西方国家形成“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别的对立。但在今天，这个问题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越来越密切了。就世界范围来说，人口问题，粮食和能源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乃至战争与和平问题都在突出人的地位。在西方国家，除了失业、通货膨胀，生活质量的问题日益尖锐；曾经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的科技进步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伦理道德的问题；随同当代物质文明的增长和人的精神发展，人对人的价值如何作出评价的问题日益突出了，人们不仅要求从社会的人的角度而且要求从生物的人的角度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行为和行为的价值，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人的世界，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同时也在日益深入地朝着更深的层次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人”的问题则集中表现于如何调动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宝库，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提供新的科学论据，在实践上将有助于社会主义方针政策的制订。

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自然远不只这些；加强理论教育还涉及教育方式、教学内容、体系结构、队伍培养和整个体制的问题，这里不可能一一探讨。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2页。

②③ 同上,第13卷8—9页,525—527页。

④⑤⑥ 同上,第19卷326页,132页,268—269页。

⑦ 同上,第22卷64页。

⑧ 参阅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集体编著《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和美国C·L·尤班克斯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目录和马克思主义参考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

⑨ 参阅《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9年第12期《作为话语的马列主义:空洞记号和双重约束的政治》。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1页。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 杨小岩)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文献选编》一书出版

由国家教委和武汉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合编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文献选编》一书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针与政策;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与计划的制订;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各类有代表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申请与管理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的条例章程与办法;科研项目、学报、学术刊物、学术活动、研究机构、科研编制、科研经费与成果管理的规定等各种文献60余种。此书是我国这方面的第一本文献汇编,对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具有指导作用。它是广大社会科学研究与管理工作者一本有益的必备指导书。欲购者请来函与武大社会科学研究处联系。

(柯平)